

# 香港傳真

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07-18

2007年3月30日

\*\*\*\*\*

## 歷史的邏輯與知識分子命運的變遷

### — 王紹光博士專訪<sup>1</sup>

《南風窗》記者 陽敏

《南風窗》（以下簡稱“《南》”）：對於1957年反右，有很多種不同的理解：有的學者認為，毛澤東搞的是“陽謀”，先“引蛇出洞”，後“聚而殲之”，反右早在計劃之中；有些學者又有不同意見，他們認為原先只是整風，後來情勢發生逆轉，才演變為反右的——我想知道，您對1957年反右持什麼樣的看法。

王紹光（以下簡稱“王”）：“陽謀”是毛主席後來自己講的，但是開始就是要“整風”。我一般講毛澤東跟別的領導人不一樣，

---

<sup>1</sup> 王紹光1990~2000年執教於美國耶魯大學政治系，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教授，英文學術刊物*The China Review*主編。訪談報紙發表了一半，這裡是全文。

他老想改革自己一手創立的制度，1949年之後他有三次大的社會實踐，第一次是“百花齊放”，第二次是“大躍進”，第三次是“文革”。“百花齊放”是他的一個試驗，他已經意識到中國新建立的，儘管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但是裡面還是有一些矛盾的地方。雖然幹部大量是工農苦出身的，以前跟民衆結合得也比較密切，但是這時候有脫離群衆的危險性，還存在一系列的問題，所以他要“大鳴大放”，要“百花齊放”。

《南》：要理解1957年反右以及先後發生的一連串社會運動，恐怕需要返回到原來的歷史語境中去。否則，我想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們，包括許多學者，都會有一個印象，認為那個時代發生的事情怎麼如此荒誕不經，不可想像……

王：當然有一個歷史背景。1949年以後，共產黨的幹部絕大部分是工農幹部，沒有受過什麼教育，這都有統計，從基層幹部一直到省市級幹部，絕大部分都沒有受過正規的教育，受過也是小學、中學的教育，大量的一點教育都沒有受。在這樣的情況下，共產黨要建立一個現代國家又要運用人，所以它把舊政權大量的人留用了——現在都講亂了，比如土改之後有地主有富農，但是當時土改法規定得很清楚，這些人幾年以後就要摘帽子，地主、富農是標明這些人在生產關係中所處的位置，在運動中是一個標籤，但是當時預計過五、六年這些就取消了，其實在1955、1956年很多地方已經給地主、富農把帽子去掉了。城市裡面更複雜一些，因為農村比較簡單，農民受一點點教育也可以管農村的一些事情。城市是現代化的產業，更複雜了，怎麼解決幹部問題呢？就把資本家、國民黨政府人員留用，我這兒有一張圖表，你可以看一眼，它顯示武漢市上層資產階級，工業資產階級，商業資產階

級，在各個職位上留用是非常大的。

表~1：武漢市 1956 年對從前資本家的安置<sup>2</sup>

從前的出身狀況	新的崗位	人數
上層資產階級	副省長	1
	副市長	1
	省局副局長	3
	市政協副主席	1
	市局副局長	5
	省或市局顧問	6
	副區長	4
	合計	21
工業資本家	董事會成員	12
	大公司經理或副經理	14
	大公司部門負責人	9
	工廠廠長或副廠長	532
	工廠科室負責人	282
	技術員	40
	普通人員	1839
	合計	2728
商業資本家	區商業局副局長	6
	大公司經理或副經理	17
	大公司部門負責人	14
	區商店經理或副經理	42
	商店經理或副經理	1274
	商店部門負責人	84
	公司顧問	10
	董事會成員	24
	技術員	2
	普通人員	2258
	合計	3731

《南》：國民黨政府官員當時也留用了不少吧。

王：大量國民黨時期的政府官員都留用到新的政權裡，包括警察都大量留用。所以，1949 年之後就出現了兩種精英，一種是跟著

<sup>2</sup> 武漢黨史研究室：《中共武漢地方黨史》，第 272~273 頁。

共產黨打天下的以工農幹部為主的新精英，一部分是舊精英，就是過去的資本家和過去的知識分子——當時大學裡面或者高中裡面，學生絕大部分不是出身普通工農家庭，絕大部分出自“地、富、反、壞”（那時候還沒有“右派”）。直到文革開始之前，絕大部分地方都是這種狀況，所以老精英還佔據有利的社會地位，甚至一些官職。

雖然 1956、1957 年有社會主義改造，公私合營了，但是這些資本家的位置還是保留了，他除了拿 5% 的利息，不管你虧損還是不虧損，共產黨把你的財產拿來估一個總量，每年按 5% 給利息，當時講給十年，後來延長到 12 年。這些人基本保留以前在公司的地位，保留原工資，他們的工資一般都比共產黨的幹部要高，這是當時的狀況，1956、1957 年的狀況。

《南》：當時也辦了工農速成中學等等，抓緊培養工農革命幹部，但是技術精英和文化精英沒有辦法在短時間內培養出來，要搞建設就必須留用老精英。所以，那時候老精英中間流傳一些話語，比如說“無產階級的小知識分子領導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外行領導內行”，可見還是有怨言。

王：1956 年大鳴大放，百花齊放有那個背景。但是，毛澤東讓百花齊放的時候，萬萬沒有想到，放出來的言論是那樣的言論。那個言論就是說“輪流坐樁”。今天很多人講輪流坐樁，民主有什麼不行？但是當時共產黨剛剛打下天下，有一批人出來講要輪流坐樁，情況就很不一樣。我自己有關“文革”的書裡引了一段後來被打成右派的人說的話，他說“至少 10~30% 的黨員應該開除黨籍。所有工農出身的老幹部都應當送去休息，年輕的新黨員應當都送去學習”。

今天的人講反右，好像是突如其來，沒有道理地給 50 多萬人戴上右派帽子。你如果去看看 1957 年的報紙放出來的言論，特別是把你放到工農幹部的位置上，你就會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工農剛剛奪了權，剛剛翻身，你讓他們去休息，你們再回來，這就是工農幹部理解的“輪流坐樁”。

最近出了一本美國人李敦白寫的回憶錄，他解放前就去了延安，1957 年在廣播事業局工作。他寫了自己當時的觀感：“當這些知識分子——學生、公務員、作家、編劇、教授、以及詩人——群起抗議時，其他人卻縮在一旁觀看。對大多數的北京市民來說，這些批評黨的人並不是爭取學術自由的英雄。相反，大部分人認為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書呆子，要求民主只是一種策略，目的是為了奪取黨的領導權，這對他們來說極為重要。郊區農民認為，如果這些知識分子掌了權，他們就會失去土地；工人也擔心失去他們剛剛爭取到的一天八小時工作制和提昇的工資。”他還提到有教授在報上發表言論後，“就必須被公安保護，以免憤怒的工人沖到他家進行攻擊。在廣播事業局，印刷工人也拒絕為某些在節目中陳述個人觀點的學者印刷講稿。‘我們工人在解放後才開始被當人看，’他們說，‘我們不會去印刷這些攻擊黨的稿子。’”李敦白的岳母是位普通勞動婦女，她乾脆把知識分子的言論稱之為“都是放屁”。<sup>3</sup>而這一切都發生在“反擊”以前。所以當時群眾和工農幹部裡面的壓力，要求反擊的壓力是非常大的，不是說毛突然一拍腦瓜說我要反右了。從底層到上層，層層送簡報，促使他做了這個決定。

實際上，1957 年是一個轉折點，地、富的帽子不摘了，因為

---

<sup>3</sup> 李敦白：《紅幕後的洋人：李敦白回憶錄》，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第 139~141 頁。

這時才突然發現這些人還是靠不住的，他們還是想變天，還想回到過去的舊秩序，還想把工農幹部都趕下來，這是當時的歷史背景。

《南》：你是說，拋開誰對誰錯不談，事實上是老精英想把新精英趕掉，新精英想辦法反擊，就出現了這場反右運動。

王：馬克斯·韋伯有一個理論叫“社會排斥”，就是說，我這個社會集團排斥你這個社會集團，它都有一個“排斥標準”。老精英集團排斥新精英集團，就是革命幹部的集團，他說你們沒有知識，沒有掌管國家的本事，我們有，所以應該你們下去休息、學習，先讓我們掌權。但是革命的新精英這時候也要排斥了，他就想出了一個辦法，你講本事、講知識，他確實沒有，但是他有革命的本錢，他工農的出身是本錢，以後之所以強調“成份”，就是這樣來的。

1957年以前上大學、上高中的絕大部分就是老精英的子弟，因為工農子弟沒有機會上，連上小學都沒有機會（哪怕你1949年剛剛開始上小學，到1956、1957年，你才小學畢業，所以高中、大學都輪不到工農子弟上），所以工農幹部只能講“成份”。本來“成份”僅僅是土改用一下，馬上就會取下，土改法裡都有，但是1957年以後之所以把它固化了，到文革特別重視，跟這個是有關係。

《南》：實際上，你認為存在兩種社會精英的社會排斥的策略，老精英的策略是強調我有知識，新精英的策略是強調我的政治背景，我的階級背景、階級出身。您對於反右的這種理解，跟現在主流講的（毛澤東）搞一個陰謀去打知識分子的理解很不一樣。

王：打擊知識分子不符合中國共產黨的利益，它建立現代國家要

用這些人啊。中國當時沒有多少知識分子。在 1956 年，整個中國只有 4.2 萬大學教師、3.1 萬工程師以及 6.36 萬技術員。在 6.5 億的總人口裡，按照中國標準只有 384 萬人可以被定義為知識分子。我們現在理解的知識分子是上大學、研究生；當時上過高中就往往被看成“知識分子”了，我小時候在父母的單位，沒有一個人上過大學，其中有一個上過高中的人就叫知識分子。就那個知識分子階層，也絕大部分不是工農兵出身，絕大部分出身於以前的特權階級，如資本家、地主、富農等。

百花齊放的時候，說讓工農幹部去休息、去學習、開除黨籍，不是一個人、兩個人，是一堆人這麼說。我 20 年前曾花了很長時間查看 1949~1966 年的各類報刊，看到 1957 年“百花齊放”時出現的言論感到很震撼，假如把我放到工農幹部的位置上，我也會有強烈的反應，我想會的。

《南》：我剛剛看了一篇關於 1957 年反右的文章，作者認為，當時除了羅隆基這幾個大右派言論有點過激之外，其餘也就儲安平講了一個“黨天下”，絕大多數言論都沒有越界。

王：你可以看一下各地的報紙。我是集中看武漢的報紙，武漢的《長江日報》、《湖北日報》當時放出來言論的，包括一些國民黨的留用人員，都是沒有什麼名氣的，他們倒不是說要民主，他們就說工農幹部沒有知識，說他們治不了現在的國家，這是言論的核心所在。

我認為反右並不是一個陰謀的結果，不是因為對知識分子歧視，才把 55 萬人打成右派，不是這麼簡單。如果事情這麼簡單，為什麼反右是發生在 1957 年，不是發生在這之前，也不是發生在這之後，再過 15 年，老精英想嚷嚷也不行了，因為有大量的工農

幹部已經受過正規教育。用兩種社會精英的社會排斥的策略去解釋，這是我看原始材料得到的感覺，我不去管歷史決議怎麼講，我不管現在的故事怎麼說，我是看原始的材料，從 1949 年一直看到 1966 年前後，花了很長時間，不過這已經是 20 年前的事情了。

當然，會不會有領導人借機報復，是一定有的；會不會有人下指標抓右派，也是一定會有的。

《南》：後來確實發生了下指標抓右派的事情。

王：對，有。到文革初期的時候又出現過一次，你可以看到毛澤東在文革裡面的反應，他並不喜歡這一套。毛澤東從 1966 年初就準備搞文革，頭 50 天，他批評的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頭 50 天各地的領導做法跟反右是一模一樣，就是下指標，我們要打多少右派，讓他們放出來，他們已經經過一個 1957 年，這一次確實是有意“引蛇出洞”，但是毛說，這是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壓制群眾，大鳴大放這個東西變成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才要造反——把這兩個連起來理解，你可以知道他真實的動機不在那個地方。有國外的專家，就是寫《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的麥克法夸爾，他講毛澤東反右很大程度上受黨內強大的壓力迫使他轉向，從大鳴大放到反右，因為黨內有強大的壓力。

我也看了大量的文件，1957 年以前講落實政策，依賴知識分子，周恩來 1956 年在一個知識分子的會上講話，都講要團結知識分子，但是 1957 年以後說這些人不可靠，所以轉折是這樣轉過來的，對政策的影響也比較大。

《南》：有學者認為，1957 年 5、6 月間發生的北大的學潮，還有一些地方發生的工人罷工和群眾事件直接促使整風運動轉向反右運動。



王：確實如此，如 1956 年底至 1957 年春，上海有一些工潮，武漢也在 1957 年 6 月份發生了所謂“漢陽中學事件”，但這是整風的背景，而不是反右的背景。

《南》：回望那段歷史，從解放後直到反右運動，你會發現各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在政權裡面確實起到很強的參政議政的作用。即便是在反右即將發生前夕的 5 月下旬，毛澤東與他的秘書林克談到對肅反中一些案件進行復查的程序問題時還說：今後黨組討論時可以先不定死，議一下交給非黨人士議，然後根據他們的討論，黨組再詳細討論定案後，再交行政會議正式通過……

王：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絕大部分是民主黨派人士。從章詒和寫的《往事並不如煙》，你也可以看到當時共產黨對民主黨派人士的待遇非常好。

《南》：可是，不論反右運動發生的歷史背景如何，但幾十萬民主黨派人士和知識分子經過“引蛇出洞”，後來又被扣上右派的帽子，是不是在客觀上造成了此後知識分子諱言政治、諱言國事的情形？

王：這個說法有點問題。首先，當時稱得上“知識分子”真的是鳳毛麟角，佔人口很小、很小的比例。按那時的標準，今天中國城市裡大多數人都可以稱得上是“知識分子”了。其次，為什麼只關心知識分子的參政議政，而不關心普通工農大眾參政議政？放到歷史的時段裡面來看，普通的民衆能夠在政治中間發揮作用，1949 年以後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我是說對普通的民衆而言。比如，1954 年憲法賦予公民選舉權，那時候的人真的是歡天喜地，選國家主席，那是一件非常大、非常大的事情。

當時知識分子參政是因為共產黨需要他們的知識和智力來參與國家的建設，如果從這個方面看，我覺得今天的參政議政，比那個時候更廣泛。

《南》：為什麼說今天知識分子的參政議政更廣泛呢？我覺得現在民主黨派，甚至包括人大、政協起到的參政議政的作用都非常有限。

王：儘管現在還是受到很多限制，但從知識分子的角度講，他們今天參政的廣度和深度，我覺得是從來沒有過的，工農反倒少了。

我們暫且拋開民主黨派究竟能夠起到多大的作用不談，不把它當成特殊的政治勢力，而是從整個知識分子在影響社會輿論、影響社會的議程設定的角度來看，我覺得他們起到的作用不是太小，而是太大。我們知道，在政策的走向上，領導人還是直接或者間接地聽取知識分子的意見，比如經濟政策，具體說人民幣應不應該浮動，外資應不應該進來這些問題，大量都是知識分子在起作用。只是現在有太多的管道，已經分不清影響究竟是從哪裡來的。

總之，大量的經濟政策實際都是知識分子制定的，而這些知識分子以前大部分是黨外人士，現在大部分在黨內，已經成為共產黨的一部分——不管它同意共產黨，不同意共產黨甚至反對共產黨，都是在黨內。所以情況跟解放初不一樣，當時的共產黨裡面知識分子太少太少，絕大多數共產黨幹部是沒有受過正規教育的，民主黨派的作用就顯得非常突出。當時民主黨派人士是有知識的，共產黨幹部是沒有知識的，但是今天情況已經發生變化了，真正的精英都在共產黨內，而不是在民主黨內。

這兩個時代不太一樣，所以僅看民主黨派大概不是好的比較。

《南》：你說的沒錯，的確是這樣。

王：如果說，因為 1957 年反右造成了今天知識分子遠離政治，就是用邏輯代表歷史，但是這個邏輯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即使在文革期間有很多右派都出來翻案，他們當了造反派，他們變成造反派得勢的時候甚至去迫害當時把他們打成右派的人，比如有一個很有名的右派詩人，他文革中間是很有名的造反派，寫了一些歌頌和鼓動武鬥的詩歌。現在右派都是講文革中間自己受了多少迫害，但是文革中間，他們有些人是造反派，迫害別人的時候他們也一點點不比別人不瘋狂，可能更瘋狂。所以人是不會學到教訓的，雖然 1957 年嚇了一下，但是以後一逮到機會，還是要說話，今天還是會說話，哪有不說話的？往往是那些說話最多的人說我們不敢說話，是不是？所以我覺得不是這樣的，現在這些知識分子哪些話沒有說？只是說推翻共產黨這句話沒有人在正式場合說。講憲政，講私有財產，所有的政策應該怎麼樣，不應該怎麼樣，哪句話沒說？都說了。西山會議，不是當著共產黨的官員說的嗎？所以都是敢說的，哪有什麼膽小的？

《南》：從建國初到現在，中國知識分子群體參與政治、影響國事的傳統延續了下來，但是這半個多世紀，中國的國情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原先的核心任務是鞏固政權，後來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所以知識分子參議國事的管道或者形式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您曾經做過這方面的研究，能不能就這個轉變談一談。

王：的確，從知識分子參政、議政形式的變化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國政治制度的深刻變遷。比如說，接近權力核心的政府智囊們，他們總是通過各種渠道向決策者提出建議，希望自己的建議能被列入決策議程。在毛澤東時代，大部分重要決策都是由毛澤

東、周恩來等最高領袖親自決定的，但內參還是有影響。

改革開放以後，內參發揮的作用更大，關鍵的原因在於，中國面臨的歷史任務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如果說毛澤東時代首先要解決的是自立問題的話，那麼改革開放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使中國自強，發展現代經濟涉及廣泛的領域，其複雜性超越了任何個人的能力，這就要求對決策輔助機制加以改造。過去那種依靠個別智囊的體制已經很難適應現代決策需要，必須用決策諮詢群體來取代。正是在這個時代背景下，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就提出了決策科學化的口號，並且著手建立和健全思想庫體系。

最早出現的思想庫可能是1980年形成的“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它的成員是一批具備“通天”關係的高幹子弟和知識分子子弟。在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和社科院的支持下，該組成員四處調研，並把報告直接送到中央領導人辦公桌上，為1981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準備了第一手調查數據。之後，他們又參與了中央關於農村的幾個“一號文件”的制定。後來，發展組成員分別進入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簡稱體改所）等研究機構。隨著改革向城市和工業方向推進，體改所的作用日益凸顯，成為80年代中國最有影響的思想庫。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989年。在此前後，另外一些智囊機構也應運而生，包括國務院內設立的若干個研究中心（後來整合成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信國際研究所等。

90年代以後，隨著經濟活動越來越複雜，研究領域的專業分工也越來越精細。因此，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各部委辦、各重點高校屬下的研究機構開始越來越積極捲入政策研究和諮詢工作。即使在以前被視為非常敏感的外交領域、兩岸關係領域，近年來也出現了幾十個大大小小的思想庫。此外，高級知識分子聚集的各民主黨派也頻繁利用“直通車”的便利向政府高層

建言、反映社情民意。同時，中央領導人還從各領域特選了一小批所謂“中央直管專家”，作為最高決策的諮詢對象。這些與中央保持直接聯繫的智囊對中央決策的影響當然更大。

這些思想庫一般都會出版諸如“簡報”、“參閱”之類的內部報告。這些發行量很小的內參，往往可以直達天庭。最高領導人則幾乎每天都會圈閱、批示、轉發一些報告。在正規的渠道之外，部分研究人員還憑藉自己的學術聲望和人脈關係通過非正常程序向最高當局進諫。

《南》：近些年，隨著一批市場化媒體的出現，以及互聯網的興起，它們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輿論導向的作用，這恐怕也使得知識分子和民間影響決策的管道、渠道發生了轉變。總之，事情變得更加複雜。

王：知識分子很大的作用是影響公共輿論，通過影響公共輿論影響公共政策。參與的渠道是什麼，有時候說不清楚，但是你看這幾年公共政策的變化，溯源的話，基本都是輿論先行。比如農民工問題、三農問題、戶籍制度問題、醫療改革問題、教育改革問題，都是先在互聯網上炒，然後進入平面媒體，甚至進了電視這樣的媒體，然後變成了公共議題，再變成了政策議題，最後變成公共決策。

儘管早在 1980 年代中期，中央領導人在提出決策科學化的同時，也提出了決策民主化，但是直到 1990 年代後期以來，帶民主色彩的“外壓模式”才越來越常見。所謂“外壓模式”，是指議程的提出者更注重訴諸輿論、爭取民意支持，目的是對決策者形成足夠的壓力，迫使他們改變舊議程、接受新議程。

當然，形成壓力的真正根源，是中國在過去 20 多年不惜一切

代價追求高增長率所帶來的一系列嚴重問題——到1990年代末，有些問題已變得令人觸目驚心，包括環境危機、貧富懸殊（地區差距、城鄉差距、居民收入差距）、缺乏經濟與社會安全（大規模下崗失業、就學難、就醫難、各類事故頻發）等。

《南》：總體來講，知識分子參政議政的情形是有所改善的。

王：精英談的參與都是高層次的參與，都是所謂的政治參與，都是要參加選舉的參與，但是，跟工人農民和普通民衆關係最密切的事情，是他（她）在企業裡面，在工作的八小時裡面，他的命運，他的待遇這些問題。他自己能不能參與呢？以前有一點參與的權利，現在卻消失了，完全被工具化了。

所以，在參與方面，我覺得知識分子總體是改善了，但是工人農民不一定改善了，是惡化了。

《南》：您認為，知識分子應該和政府保持一種什麼關係比較恰當？

王：知識分子沒有任何特權，你可以說話，政府可以聽也可以不聽；既然知識分子沒有什麼特權，他們除了要呼籲自己參與以外，也要關心普通的民衆的參與。我看有些所謂“知識分子”太看重自己，把其他東西忽略掉了，而且很大程度上工農的權利被剝奪是某些知識分子忽悠出來的。

比方說產權，一旦產權定了，資本家就可以決定這個工廠的事情怎麼辦，但是另一種理論講人權比產權重要。哪怕政治上的領導者是選出來的，但是資本家不是選出來的，資本家做的決定會影響一個企業幾百人、幾千人的命運，把一個人開除可以影響一家人的生計。資本家的決策權為什麼不應該受到工人參與的制

約，這是毫無道理的。一些知識分子把產權說成天經地義的事情，參與經濟和社會決策過程的人權反而不是天經地義的。

我們講經濟民主，就是說所有利益相關者都可以在跟他們利益相關的地方有發言權、有參與權，一個企業不光是老闆有權利決定，普通的工人也是利益相關者，甚至工廠周圍居住的居民也是利益相關者，比如排污，你可能影響到工廠周圍的居民，或者你在上游排污，下游的企業也是你的利益相關者，所以利益相關者遠遠超過幾個投資者。而我們的產權理論就是講我們的企業是老闆的，他做任何決策都是理所應當的，有些經濟學家就來證明為什麼應該是這個樣子，這完全是為了剝削辯護。所以，我覺得有些讀過幾天書的知識分子太把自己當回事。雖然我自己受了幾年教育，但是我十分瞧不起這類“知識分子”。

《南》：跟國外的情況比起來，中國知識分子對政府決策的影響的確很大。

王：太大了，不成比例。你看政協是精英俱樂部，政協裡面幾乎沒有地地道道的農民了，人大裡面工人、農民也越來越少。這些我們也計算過，80年代初，人大裡面有50%以上是工人、農民，現在完全不是，現在大概20%左右。他們佔人口的比重可不是20%，知識分子、幹部在那裡面佔的比重就太大了。

《南》：你怎麼看今天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問題？

王：我現在不太關心知識分子的命運，我比較關心工人農民的命運。相對而言，知識分子的命運已經很好，跟中國其他階層比起來，他們是最好的了。比如，以前有一句話講：造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即使在這句話最盛行的時候，工人的工資也從來沒有

跟知識分子能比的時候。由於這句話，他們能影響或者忽悠決策者，他們命運的改變、福利提高的速度也快得多——我跟胡鞍鋼做過很有意思的事情，我們把不同的人群劃分為不同的社會集團，看他們在人大和政協裡面的比重，以及比重變化的速度；另一方面我們再看不同社會集團工資待遇提高的幅度，有趣的是這兩者是相關的。其中知識分子變化最明顯，他們在人大政協裡面所佔比重提得越高，他們待遇提高的速度就越快。

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老是會問知識分子命運的問題？關心工農大眾的命運更重要。

《南》：改革開放以後，尤其到 20 世紀 90 年代中後期，知識分子圈子化、利益集團化的趨勢確實很明顯。我想，這個也不用多說，最近一、兩年媒體上關於這個問題的爭論也逐漸明晰起來，對於主流經濟學家的質疑就是很好的例子。對此，您有什麼看法？

王：我覺得現代史已經被歪曲掉了，在局外人看來，中國政治裡面充滿了荒唐、充滿了瘋狂——這不符合邏輯，也不符合歷史的事實，但是知識分子為了他們的利益敘述歷史，就不得不把這些歷史展示成那樣的方式。如果用那種方式展示，歷史就變得非常瘋狂，沒有道理的瘋狂，但是當你真正挖掘史料的時候，發現歷史不是那樣，它有自己的邏輯，這個邏輯已經不是誰對誰不對的問題，而是說，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有不同社會集團之間的競爭，矛盾就用那種方式展現出來了，它們是有內在邏輯的，如果掌握了這個邏輯你可以一直追溯到土改，有很多事情就說得清楚，但是你沒有這個邏輯一切都說不清楚。

今天，我們看到大量的歷史被顛倒、被歪曲、被簡化、被後人的敘述方式重新解讀，但這個歷史就不是原來的歷史了。1957



年是如此，土改是如此，大躍進是如此，文革是如此，幾乎都是如此。剛解放時有句口號，叫“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現在似乎有重提的必要。

《南》：您認為現在中國知識分子對於決策的影響不是太小，而是太大。不過，就個人影響政策而言，我想很少有知識分子像您一樣能夠發揮這樣大的作用，比如 20 世紀 90 年代的兩稅制改革，以及醫療改革等等。您做研究的時候，有沒有預想要影響政策？

王：我沒有。我關於稅制的研究是在美國耶魯大學做的，在美國發表了，胡鞍鋼當時到耶魯大學做訪問學者，他說你這幾樣東西很適合中國用，我們就弄了《中國國家能力報告》。

稅制改革這個事情，其實財政系統內部的人早就有人在提。《報告》之所以讓領導人覺得很重要，是因為跟他們的經驗吻合了——稅制再不改，中央掌管全國經濟的能力都沒有了。後來我寫了另外一篇文章，〈美國進步時代的啟示〉，發表在《讀書》上的，我沒有想去影響任何人，但是有領導人看到了，拿到全國財政會議上講。只能說，這項研究正好適合了那個時代的需求，並不能說明這個人有多聰明或者有內部關係，一點都沒有。

只有關於“軍隊不許經商”這個報告是我們當時不得已才寫的內部報告，因為國內沒有媒體給你發這種文章，話題太敏感了，只能對內部發。1998 年，江澤民做軍委主席的時候，才正式宣佈軍隊與商業脫鉤。我們不敢說這項政策的頒佈跟我們的研究有任何關係，但是我們確實在 1993、1994 年給有關方面看過有關軍隊應該“吃皇糧”的報告，他們都贊同我們的意見，因為當時財政撥款只管六成軍費，其餘四成由軍方自行籌集。

《南》：會不會有人因此質疑你們跟政府關係太過密切，懷疑你

們作為知識分子的獨立性。

王：我從來沒有為政府說話。我也覺得，獨立性本身並沒有任何的道德優勢，如果故意要裝出獨立的姿態，我覺得這還是知識分子自戀的表現。如果我的研究有助於政府決策，對這個國家，對人民有好處，為什麼不做？我說過，我的研究碰巧有些影響，但確實很大程度是無心插柳。

我以前跟崔之元開玩笑，我說你老是在尋求怎麼能帶來最好的結果，我說我就是防止中國出現最壞的情況，1993年的稅制改革如此，強調地區差距也是如此——我看到大量的國家因為差異過大而導致分裂，導致不穩定。軍費問題、預算問題也是一樣，包括後來的醫療改革、礦山安全，雖然我研究的對象好像千差萬別，但是從邏輯上講，都是為了防止中國出現最壞的情況。

《南》：我想您跟許多知識分子不太一樣，我看過《國家能力報告》那本書，還有您關於文革的研究，醫療體制改革的研究，都有很扎實的調查和數據，來龍去脈很清晰。

王：有些所謂“公共知識分子”就是嚷嚷兩句，批評兩句，但是從來不做任何研究。你用“GOOGLE學術搜索”去查，有些所謂非常“著名”的學者，幾乎從來不被學術刊物引用，也沒有幾篇文章發表到學術刊物上，他們的文章往往只有強詞奪理的觀點，沒有腳踏實地的研究。我現在不願點名，但是有一批這樣的人，只有觀點，非常武斷，而且往往是錯誤的，但是不需要論據，不需要論證過程……